上頭條，找中國新報 中國新報

尋找工業題材和年輕觀眾溝通的思想橋梁

【文匯報】今年以來，在電視屏幕上，我們隱約看到一種“工業叙事”在默默地崛起。比如最近熱播的《麓山之歌》《沸騰人生》《大博弈》等電視劇裏，久違了的工廠的廠房、藍色的工裝……均出現在屏幕上。不過當前這些帶有工業色彩的電視劇，似乎更多停留在“工業題材”的類型框架內，還沒有獲得足夠的叙事方式來超越題材類型，讓人們對“工業”本身產生濃厚的興趣，也不足以引發人們對于“工業叙事”的集中討論。

但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物質基礎，講好“中國故事”，講好“中國式現代化”的故事，工業叙事一定會是其中的重要基礎。因此，當這些自覺選擇了工業題材的電視劇出現在屏幕上時，理解分析這些電視劇的特點，探討其發展方向，也是評論者特別需要關注的。

首先我們要看到，工業題材電視劇的出現，在題材上，如果說它不是對一段時間以來“霸屏”的懸浮“職場劇”的一個有力阻擊，至少也是對這一題材類型越來越蒼白無力的有效補充。

現在所謂的職場劇，大多是寫字樓裏的“職場”。誠然，寫字樓的生活構成今天年輕人生活的一個主要場景，但工廠，卻是支撐着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場域，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支撐性力量。大衆文化領域的職場劇，幾乎本能地會選擇靚麗的街景、高級寫字樓、標準的工作間、溫馨的咖啡館等等，作為呈現的物質對象。在一段時期內，這些職場劇確實塑造了一個個白日夢，給了很多年輕人進入大城市工作的動力。而隨着越來越多的青年走向“職場”，白日夢逐漸變得“懸浮”——青年們早就發現，沒有人天天在宜家的樣板房裏談戀愛，也沒有人天天上班就是喝喝咖啡以及勾心鬥角。也正由于此，各種工業題材電視劇的出現，讓我們在甜膩膩的大衆文化中，“看到”了中國生活的不一樣的場景，看到了工業化的大廠房以及在廠房裏工作的工人。當這些與城市白領不一樣的景象與人物形象出現在屏幕上時，從題材到視覺，它們都是新鮮的，也都是有着新的可能空間。

但能不能在當下的創作環境中异軍突起，創作出中國式的工業叙事，工業題材的電視劇恐怕還有着很長的路要走。

當前的職場劇很多被吐槽為“懸浮”——創作者對自己所寫的電視劇所涉及的具體行業不熟悉，恐怕是根本原因。比如《玫瑰之戰》，雖然有美劇《傲骨賢妻》做故事基礎，但太脱離中國場域的律師行業競爭邏輯與辦案流程，再怎麼有大牌演員都救不了場。而我們的工業題材電視劇，目前可見，好像在創作方法上也仍然延續着職場劇這一“類型劇”的創作模式。比如說《沸騰人生》，感覺上就是把職場的故事，放到了工廠這樣的一個特殊場景之中。雖然有工廠場景以及工廠的發展歷程作為背景，但故事重點還是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。

更重要的一個問題，是在創作思路上。現有的工業題材電視劇，大多延續着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感模式，過于強調企業家的個人奮鬥，強調企業家精神，而忽略了工業發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。中國工業的崛起，不僅是來自企業家的創新精神，還來自各級政府的推動，更重要的是，來自企業家與其團隊的集體拼搏。沒有工人團隊與工人集體的貢獻，祇有企業家精神，是支撐不了中國的工業叙事的。

萬茜在《大博弈》中飾演工程師錢萍

比如電視劇《大博弈》。在這部以某大型重工為原型的作品中，周梅森塑造的孫和平、楊柳與劉必定三個企業家，圍繞着誰能控制重卡全產業鏈的博弈，本身是非常精彩的。編劇在這部電視劇裏塑造了三種不同的企業家：孫和平是當代國企改革的代表人物，改革之初即銳意進取，改變國企生產效率低下的毛病，并不斷擴展企業發展空間；劉必定是草根崛起的代表人物，擅長資本運作，雖不乏坑蒙拐騙之弊，但總的來說也是要把中國企業做大做強；楊柳作為國有企業集團老總，更為看重集團的整體利益，不但是要兼顧集團內部落後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的平衡，更不能容忍孫和平把企業一做大就要脱離集團。這三個人的較量，既是不同類型企業家的較量，也是不同個性的企業家的較量。也因此，我們在劇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業家的個性，是企業家克服重重困難，突破重圍的勇氣。但是，除去口號般的“減員增效”“擴大融資”之外，我們看不到企業家所要經營的工廠的故事：看不到在改革開放之初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工廠的困難重重，看不到工廠如何革新就能從瀕臨破產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，更看不到工廠員工如何參與企業革新的過程。在該劇叙事邏輯中，似乎祇要大家一持股，工廠產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。這對今天熟悉中國工業艱難成長過程的年輕觀衆來說，是缺乏說服力的。

相比之下，《麓山之歌》在這方面有很大突破。《麓山之歌》也是以某重工企業為原型，開篇也是企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要剝離不良資產，以“重工換金融”的方式來挽救企業。但在這個過程中，創作者非常清晰地描述出工業企業面對的現實問題：產品的核心技術由外企掌握，一旦企業對這一核心技術形成依賴，外企就通過迅速提價的方式，抬高生產成本；而中國企業在核心技術上有一點突破，外企就毫不手軟地繼續以降價的方式擠占市場。在外企的步步緊逼之下，在《麓山之歌》裏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企業領導的思考與拼搏，也有從工程師到工人隊伍整體面對國際資本圍追堵截的不甘心。在電視劇中，從宋春霞到金燕子兩代的一綫工人，不僅是出于對生長于斯的工廠的感情，更重要的是出于對自己所掌握的工業技術的熱愛，憑借自身的技術能力，助力企業突破國外的技術壁壘，完成重裝工廠的新生。在這裏，工人們不再祇是每一個上任的廠長、書記因為“減員增效”所要解決的“麻煩”。他們不祇是被動等待施救的“困難群衆”，而是因熱愛技藝而自強不息的新工人。當我們看到，在國外企業的重重幹擾之下，宋春霞仍然克服種種障礙，用自己的雙手完成了高難度的車工工作，讓外國資本收回對中國技術的指控，我們不能不對“大國工匠”產生油然而生的尊重。

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尊重工人群體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的叙事，讓《麓山之歌》在年輕觀衆中收獲了許多贊譽。如果說原來的觀衆群體，對于改革英雄有很大的好奇心，但在今天新的社會環境裏，年輕觀衆對于獨樹一幟的改革英雄，恐怕不會再有那麼好奇。《麓山之歌》裏高揚着的自強不息的精神，對每一個普通個體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的尊重，恐怕是與今天青年觀衆溝通的密碼吧。

從某些意義上說，電視劇這樣的大衆文化，幾乎必然會“自動”選擇“類型劇”的架構。因而，我們現在看到的工業題材電視劇，很難一下子擺脱類型劇的框架，也很難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邏輯。但中國畢竟是有着現實主義文藝創作傳統的國家，其文藝創作方法的多元性，還是給我們突破以精巧編劇法為支撐的類型劇的可能空間。當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，當“中國式現代化”引領我們去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，我們的創作者，回到現實本身，理解工業企業自身的運作邏輯，尋找當下工業題材與青年觀衆溝通的思想橋梁，工業叙事也許會創造出中國電視劇的新空間。

（陶慶梅，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）